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

——以明清陕西三原为例

张萍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710062）

摘要： 本文以明清时期陕西三原县为典型，分析了中国传统时代封建城市经济发展与景观变迁的关系。探讨了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引发的人居与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论述了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条件与机制。明清两代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城市的经济职能。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景观变迁，以及由城市景观变迁所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

关键词： 明清；陕西三原县；城市经济；景观变迁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景观”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全书。在英语、德语、俄语中拼写相似。19 世纪初期，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V.Humboldt）最早提出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以后景观作为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不断被引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断发展、完善。在景观生态学中，人们更加注重研究人类对于景观的广泛影响，把人们的行为包含在生态系统中进行表述与分析，对了解景观建设和管理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十分有利，其研究意义也更加深远，学科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城市景观作为人类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更加剧烈的地域，城市景观的动态活动往往表现在城市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张以及城市内部根据运转效率规律进行城市功能的重新组合，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景观生态建设，更好地利用自然景观达到人与自然的合谐发展。

历史时期城市景观动态活动同样适应以上规律，研究历史时期城市景观发展、演变及动态过程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历史时期人类经济行为改变生境的过程与力度，即自然景观向人工景观转化的机制，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历史时期城市职能转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的变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具体研究明清时期陕西三原县城市发展及职能转变的过程、机制，并由此所带来的城市景观格局的变化，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　三原城市经济发展条件与机制

谈及明清陕西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说三原，三原作为渭北高原上的县级城市，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曾有学者提出观点，认为明清时期在陕西道路建设上，出现了商路与官驿大道的分离现象，带来了陕西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从而形成了“政治以西安为中心，经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二维社会结构”。虽然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明清时期，三原与泾阳两县城市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则是一个事实，它的发展曾带动本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城乡景观格局发生变化，影响深远。

1．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以及发展商品生产的物质基础。不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自然环境各要素都遵循着自然界内在的规律，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当然也影

响着商品生产的数量、质量、品种，以及流通、分配各个环节的全过程。三原县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明清三原商业中心的发展亦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良好的地貌条件。

三原县位于咸阳市北，关中盆地的中部，。因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故得名三原。从地名已不难看出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平原广畴，水流环绕，人口集中，交通发达，是陕西“形胜之区”，“关中之上郡也”[①]。三原开发较早，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东晋设县。元末明初，三原经济已较发达，人称“小长安”。

明清时期三原县农业经济一直较为发展，为陕西的粮棉基地，经济发展优于邻封。这种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支撑其商业中心发展的重要物质力量，也是提供大批游离于农业之外的手工业、商业人员生活资料的基本条件。这是明清时期三原与泾阳成为陕西商业中心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2．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交通基础

明清时期三原县是陕西通西北的交通中枢，城内设有官营驿站建忠驿，建忠驿北通延榆，西达甘凉，是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驿站。明清陕西对西北贸易联系的通道与今天略有不同。通西北道路走向不是过西安走宝鸡而达天水、兰州；而是从渭水驿（西安）达建忠驿（三原），走邠州新平驿、长武宜禄驿达平凉，通固原与兰州。这条道路走向又使三原、泾阳成为通西北交通道路的中枢，提升了两地的交通地理地位。三原县的交通条件非常优越，“三原位于平原，其与附近各县城之间，可谓四通八达，道幅多丈许”[②]，运输车辆行走畅通无阻。它成为成就三原商业中心的交通保障。

3．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促动机制——明代陕北军事消费需求

明代是三原城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它的发展主要受明王朝对蒙古军事战争需求的影响。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以后，蒙元残余势力被驱赶到漠北草原地带。这一残余势力退回漠北，形成对朱明王朝又一强大对抗势力，不断骚扰明朝北边，构成明王朝的边患。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③]。明政府为对付这一敌对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构成王朝一大重要国防系统，贯穿始终，甚至影响到王朝的盛衰兴亡。就其时其地，对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更是至为深远。陕西即是一例。

明代陕西疆域较今大出许多。其时陕甘尚未分治，陕西北部地区又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因此，整个明代，陕北在一统版图上是一片较为特殊的区域。自始至终沿边一带没有形成行政建置上的州县分区，而是军政体制相参而用，营堡、镇寨周密布设。这些军事性营堡的布设又与整个王朝在北部军事防线的进退相一致。

洪武年间，明王朝初建伊始，对北部边疆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策略，建立起一整套带有攻击性质的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大宁、甘州为连结点，分设都司与行都司，把所辖的开原、广宁、开平、兴和、宣府、东胜、宁夏的各镇卫连结起来，形成坚固的防线，力图将蒙古势力阻隔在漠北之地。这一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东胜、甘州为主体，基本沿黄河以北布设。陕西深处内地，并非防卫主体，分别设于洪武四年（1371 年）、洪武十二年（1379 年）的宁夏、甘肃两镇担当了这一带军事防卫的重任。 “土木之变”，英宗被掳，明政府与蒙古的争战白热化。与此时间大体相当，蒙古军队南进，占据鄂尔多斯地区。这样，蓟州、宣府二镇成为明朝国都北门的重要屏障，开始与大同处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延绥、山西镇（偏头关）的战略地位也大大提高。陕边四镇驻军不断增多，布防不断加强（参表一：

---

①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一《地理志》。
② 刘安国：《陕西交通契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县城》，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 5 月版。
③ 《明史》卷九一《兵三》，中华书局 1974 年 4 月版。

明代陕西四镇兵员统计表）。

表一:明代陕西四镇兵员统计表[①]

	嘉靖二十年兵员数	隆庆末年兵员数	万历时期兵员数	崇祯时期兵员数
延绥镇	4．4984 万	8．0169 万	5．5379 万	4．514 万
宁夏镇	3．2714 万	7．1693 万	3．7837 万	2．5167 万
甘肃镇	4．0537 万	4．7512 万		4．0548 万
固原镇	4．7844 万	7．1918 万	5．52 万	5．983 万

随着军防力度的加大带来军事消费的增加，宁夏、固原、甘肃、延绥四镇大体相当，其中最主要的就有以下几大需求。

第一、粮食需求。就粮食来讲，陕西四镇均建立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沙漠边缘地带，这里土地沙瘠，粮食生产困难，“……兼以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②]，当时陕西四镇粮食主要由陕西八府税粮支给，梁材《议处陕西四镇边储疏》（《文编》卷一 0 四）说：“……陕西八府税粮例不解京，专一拨派延宁、甘肃二镇并固原等处，以供军饷。”不足者再由山西、河南等省民运粮支给。除此之外，明政府还在此处实行民屯与商屯，粮食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买卖成为陕边四镇重要的贸易对象。

第二、棉花与布匹需求。除大批量的粮食需求外，对于陕北沙漠边缘区的四镇来讲，其它物品的需求量同样不小，如棉布、棉花，按明制规定，每名士兵大约年赐棉布二至四匹，棉花每人约一斤八两左右。以陕西四镇二十万军队计，每年需布六十万匹左右，棉花三十万斤。《全陕政要》记，每年四镇需布五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三匹，棉花二十五万四千五百三十八斤。陕西四镇所在区域均不产棉花，这些棉布、棉花均靠外运，据顾炎武称，明代“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③]，较之江南产棉区价格更要高出许多了，因此沿边一带这种消费市场也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陕西本省棉花与布匹均供沿边四镇，即使如此，每年大约有一半的需求还是要靠外运，其时运入沿边最多的莫过于松江、上海一带所产的“标布”。陈继儒《布税议》“……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日标商。领各商之资收布者，日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经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糜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不息。此天下之大命也……”这种棉布买卖带动了本地与东南地区的产品交换。

第三、其它互市货品需求。与蒙古交战时起时伏，由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产品交换需求，双方互市时常进行。范濂《云间举目抄》卷四“记赋役”“……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赍松郡。而牙行辈指

---

① 资料来源据《皇明九边考》《嘉靖宁夏新志》《天府广记》《九边图说》。

② 唐龙《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2 年 6 月版。

③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纺织之利》，据清道光十四年嘉定皇室西溪草庐丛刊定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为奇货，置酒邀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据《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载，双方互市的商品，内地有缎、绸、布、绢、棉、针线、篦梳、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金等，交换蒙古牧民的有马、牛、羊、骡、驴、马尾、羊皮、皮袄等。当时为维持双方互市，各镇经常派出采购军士，去各地采买货品。如榆林镇城的抚赏库、药局、置造局尚储有“发买到江浙等处缎绢、梭布、皮料”等物品，以及“川广诸药料”、“发买到诸铜铁督匠打造盔甲、炮铳诸器械”[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镇城的货物来源不仅有附近省区如山西、河南者，且包含有江南、川广南方市场上的商品。

大量边方商品需求促进了西北与东南地区的商品交换，形成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商业城市的发展及城镇商业职能的扩大。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二、明代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

由于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与交通条件，明代陕北军事消费需求又促成本地与东南各省的商贸联系，成就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契机，使这里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也成为西北商贸与信息中心。

明代三原县城商况盛于西安。一方面表现在各商业区商品品种齐全，居民所需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另一方面行市分区的产生有利于大宗商品的集散与转输，使城市商业职能加强。当时，三原县商业街市颇为繁华，“四方商货日云集阛闾”[②]，城市之中，“集四方商贾重货，昏晓贸易”[③]。富商大贾东走齐鲁，西逾陇蜀，“四方任辇车牛，实绾毂其口，盖三秦大都会也”[④]。

它的商业职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西北边区服用物品的供应基地。明代陕西四镇所需军需用品仅布匹一项每年就要消耗大约六十万匹，[⑤]陕西本省仅能提供一半左右，其余三十万匹均需外运，[⑥]这些布匹大多来自江南，这还不包括贡市的需要。它成就了三原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带动了三原商品经济的发展。史载“盖三原天下商旅所集，凡四方及诸边服用，率求给于此，故三原显名于天下”[⑦]。三原县城门上便冠以“西达甘凉”、“三边要路”的石额。第二，它是本省各县的商品供应地。三原商业市场繁华，供应物品齐全，许多州县市场上的商品均来源于此。耀州距离三原最近，本州市场不甚发达，“人持五金以上者，率就三原以市”[⑧]，成为耀州的商品供应基地。延安府东关市，“旧俗止以布货易，凡日用冠婚丧祭之需俱市诸别地。弘治年间，知府王彦奇下车，深为痛惜，乃立会，聚四方商贾贸易于此，以通货利，自是延民及西北边方用需悉便，远近军民颂声塞满人耳”[⑨]，其货物亦为三原提供。

明代的三原商税课程钞折银达“一百一十六两七钱二分”[⑩]，而当时泾阳仅有六十八两九钱，西安府（咸宁、长安二县）只有四十九两三钱，[11]可见三原县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有

---

①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边饷·贮所》。
② 温良儒辑，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九，《温氏丛书》民国 25 年铅印本。
③ 康熙《三原县志》卷六《艺文志》温纯三原龙桥。
④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⑤ 嘉靖《全陕政要》，四镇每年需布“五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三匹”。
⑥ 田培栋：《明代关中地区农业经济试探》，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⑦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⑧ 乔三石：《耀州志》卷四《市集》。
⑨ 弘治《延安府志》卷一《肤施县》。
⑩ 嘉靖《陕西通志》卷之三四《田赋》。
11 嘉靖《陕西通志》卷之三四《田赋》。

逾泾阳、西安。

另外，三原县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这里经商人数大量增加，从三原县商人数量上也能反映出明代三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载："……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这就是说，所谓陕西商人，大多来自渭水沿岸，以西安府三原县为中心。对此，朱睦桔在《山西右参议李景繁传》（《国朝献征录》卷九七）中写道："李景繁，……成化五年举进士，授陕西三原知县。三原多大贾，鬻贩淮扬间，资累数万。"光绪《三原新志》卷八杂记条，引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三原县人温纯的文章云："温恭毅公雅约序云：……吾三原士半商贾，衣饰大率袭吴越广陵，士亦因而化焉"。可见三原经商人数之众，影响之大。

下面二表是以康熙、乾隆两朝《两淮盐法志》中的材料为主，并参照同治《两淮盐法志》卷四七科第表对明代两淮山陕籍商人科第者进行整理。表一所列为明代两淮山陕商籍登进士第人员统计，共计三十六人，而陕西三原县出生者计有十七人，约占总人数的 47.2%。表二是对明代两淮山陕商籍考中举人人员所作的统计,共计四十三人,陕西三原县出生者计有二十二人,约占总人数的 51.2%。两表显示山陕商人中三原人数均为最多。

表一：明代两淮山陕商籍登进士第人员统计表[①]

正统戊辰科	1448	王恕（陕西三原人）
景泰辛未科	1451	赵谧（陕西泾阳人）
成化丙戌科	1466	魏秉（陕西蒲城人）
成化己丑科	1469	梁泽（陕西三原人）
成化壬辰科	1472	赵兰（陕西泾阳人）
成化甲辰科	1482	何宗贤（陕西泾阳人）
弘治癸丑科	1493	王承裕（陕西三原人）
弘治乙丑科	1505	秦伟（陕西三原人）
嘉靖癸未科	1523	秦稿（陕西三原人）雒昂（陕西三原人）
嘉靖乙未科	1535	来聘（陕西三原人）
嘉靖辛丑科	1541	梁木（陕西三原人）
嘉靖丁未科	1547	亢思谦（山西？）
嘉靖丙辰科	1556	李思达（陕西泾阳人）李承式（山西大同人）
嘉靖乙丑科	1565	温纯（陕西三原人）
万历甲戌科	1574	李植（山西大同人）
万历庚辰科	1580	阎世选（陕西？两淮商籍）

① 本表转引自张正明等译，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第五章"山西商人谱系"第 221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986 年六月版。

万历癸未科	1583	牛应元（陕西泾阳人）
万历丙戌科	1586	李杜（山西大同人）
万历乙未科	1595	高邦佐（山西襄陵人）
万历甲辰科	1604	马呈秀（山西大同人，两淮商籍）
万历丁未科	1607	秦一鹏（陕西三原人）焦源清（陕西三原人）
万历癸未科	1613	韩继思（陕西泾阳人）马逢皋焦源博（陕西三原人）
万历丙辰科	1616	来复（陕西三原人）韩琳（陕西泾阳人）
天启壬戌科	1622	李柄（山西大同人）武献哲（陕西临潼人）
崇桢戊辰科	1628	杨义（山西大同人）
崇祯辛未科	1631	秦新式、房廷建（陕西三原人）阎汝梅（陕西绥德人）
崇祯癸未科	1643	张询（陕西泾阳人）石隆（陕西三原人）

表二：明代两淮山陕商籍考中举人人员统计表（不包括已进士及第者）[①]

永乐甲午科	1414	申春（三原人）仇庄（三原人）
永乐癸卯科	1423	雒守一（三原人）
景泰庚午科	1450	韩清（三原人）孙佐（三原人）
天顺壬午科	1462	寇恕（泾阳人）申琼（三原人）马桢（三原人）
成化辛卯科	1471	杨九皋（泾阳人）牛昭（泾阳人）来贺（三原人）
成化甲午科	1474	康渭（泾阳人）马栻（三原人）
成化丁酉科	1477	强书（泾阳人）
成化庚子科	1480	茹巨鳌（泾阳人）
嘉靖辛卯科	1531	阎复（绥德人）
嘉靖丙午科	1546	李承弼（大同人）
嘉靖乙卯科	1555	韩复礼（泾阳人）
嘉靖丁卯科	1567	韩易知（泾阳人）梁茂（三原人）
嘉靖壬午科	1582	梁松（三原人）
嘉靖乙酉科	1585	张嶙（泾阳人）阎士聪（陕西？）

[①]本表转引自张正明等译，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第五章“山西商人谱系”第 223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986 年六月版。

嘉靖午子科	1588	亢秉忠（山西人）李楫（大同人）
嘉靖辛卯科	1591	雒献书（三原人）
嘉靖甲午科	1594	梁应基（三原人）李于奇（三原人）
嘉靖丁酉科	1597	亢孟桧（山西人）
嘉靖癸卯科	1603	张善治（三原人）房象乾（三原人）
嘉靖丙午科	1606	石胜（三原人）赵虞佐（泾阳人）
嘉靖壬子科	1612	刘有纶（河津人）
万历乙卯科	1615	梁文熙（三原人）
万历戊午科	1618	秦四器（三原人）仇让（三原人）
万历辛酉科	1624	鱼赐腓（泾阳人）
天启甲子科	1624	毛宗昌（泾阳人）秦际皞（三原人）
崇祯庚子科	1630	王弘祥（三原人）
崇祯丙子科	1636	张惇（泾阳人）何漠杰（泾阳人）

三、清代三原城市经济职能

清初，受明末战争的影响，三原县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冲击。李自成起义军入踞关中，曾对三原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岁一千八两，相沿六十余年”，一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知县余琏申请豁除”后，将税银变为“尽收尽解，岁额少收一半，只解银七百八两”，但税名仍存。它造成三原商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东南而来的货物往往改途邻封，一时间三原成为商贾经营之畏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知县李瀛甫再次上疏，请求分并三关（大庆关、潼关、龙驹寨）税收，而减原之负担，终于得到朝廷许可，“自是商贾流通，称殷繁矣”[①]。

清代三原城市市场职能较明代又有所完备，作为西北商贸中心——西安城市市场的有效补充，许多大宗商品的加工、批发与转运功能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加强。城市各商业区集中了大量商品零售与批发店铺，布匹店、百货店、花店（棉花店）、盐店、药材店，不仅规模大，数量也非常可观。以药材店来说，“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街到东渠岸街一带，满目皆为药材店”。[②]大量具有批发、转输功能的商业店铺使三原商品市场的吸纳功能增强，清末三原县商业市场大致担负着以下四类商品转输功能。

第一，三原是东南各省布匹远销西北的集散中心。这一点在明代已有体现，只是当时布匹来源大多集中在松江、上海一带，以其周围所产“标布”为主要买售对象；且主要供给四镇官兵军资之用与边贸贡市所需。入清以后，随着西北边疆平靖，军事消费大大减少，维持军队布匹供给的需求量减弱，而民用布的需求则有所增加。由于清代西北地区统一疆域较以往更加广大，人口大量增加，而西北地区纺织技术普遍落后，运往甘、宁、青、新等地的布匹、绸缎数量可观。西北交通道路的开辟又使三原成为联系整个西北区域的枢纽城市，尤其

[①]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三。
[②]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5月版。

在同治以后，三原的商业地位更加提高，经此转输西北的布匹数量更大，这样，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布匹转运中心。同治以后，三原征收厘金总数表明，“大布居十之五，药材、棉花约各有二，皮毛、杂货又一成而已”[①]。甘肃则专门设有“三原大布统捐”。布匹来源包括湖北“德安、历山、淅河、随州、枣阳、应山等布”，也有名为“梭布、阔布、猴布、台子小布的”[②]，统名之为大布。这些布产自湖北，经白河或龙驹寨运抵三原，再进行改装、染色，然后分东南与东北二路入甘。三原成为布匹改装、染色与转运中心。

第二，三原是西北药材外运的集散地。药材是清代西北出口量最大的货物之一，药材产自川、甘及本省南北山，由于这里山多土旷，所产药材名贵、上乘。如：乾州“最著者为红软柴胡，即所称西柴胡，为国药中地道佳品，产量颇丰，运销四川”[③]。醴泉县所产地黄极为有名，“按地黄本产自河南怀庆，以邑城北志公泉水，九蒸九晒，如法炮制之，性味极佳，故有醴泉九地之称”[④]。这些药材经过三原“转贩豫、晋、鄂、苏等处销售”[⑤]。三原既是药材再加工中心，也是转运与外销基地。宣统年间统计，三原局所征商税厘金中，除大布厘金所占比重较大外，就属药材了。

第三，三原还是本地及渭北周围地区商品外销的基地，“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⑥]。本地所产棉花、回绒毡、布帽等大多汇于三原而销川、甘[⑦]，尤其棉花一项。晚清时期，渭北各县均出产棉花，而三原则为之绾毂，当时“汉中及川北附近陕省等处，纺纱捻线皆用陕省河北一带所产之棉，每至秋冬，凤县、留坝一路驮运棉花，入川者络绎于道”[⑧]。这些棉花大多经三原输出，故三原厘金以布、药材、棉花为最多。被誉为“陕西渭河以北商业之中心”[⑨]。

此外，清中叶三原与泾阳二县还是关中地区的金融中心，关中各县银钱多半以泾阳、三原为标准。据光绪年间《续修大荔县旧志稿》卷四《钱法》记载：“荔境，回乱之先，闾阎富庶，街市流通银两易钱多则一千二三百，少则一千有奇。然价之涨落，率视泾（阳）、三（原）为标准，以该处地当秦陇商贸孔道，富商大贾皆屯聚于泾阳一带，荔邑钱庄生理多随之为升降。”

四、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景观变迁

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景观的变迁。这种景观上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外在形态的改观。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城池的拓展，三原县城建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364 年）。“城肖钟形，北阻河（今名清峪河），河深十丈余，岩险可据”[⑩]，周围凡九里一百八十步，也就是后来的三原南城。从嘉靖《陕西通志》所绘“城图”可以看到，明初的三原县城确为一肖钟形城池，北依清峪河，南为南郭城。入明以后，

---

① 经济学会编辑：《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次编上《百货统捐》，民国铅印本。
② 经济学会编辑：《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次编上《百货统捐》，民国铅印本。
③ 民国《乾县新志》卷之五《业产志》。
④ 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二《地理志·物产》。
⑤ 陕西清理财政局编辑：《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金》，清宣统元年排印本。
⑥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 5 月版。
⑦ 陕西清理财政局编辑：《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金》，清宣统元年排印本。
⑧ 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上《入境货物表》，《关中丛书》。
⑨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西安》，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 5 月版。
⑩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随着三原经济的蓬勃发展，“凡四方及诸边服用率取给于此”[①]。县城人口迅速膨胀，难以容纳，以至清（峪）河以北，人烟凑集。至明中叶“守其北居民与南等”[②]。三原北面无城，但居住人口已膨胀到与南城相当的程度。嘉靖二十年（1541 年），巡抚谢蓝增筑北城，由于北城居清峪河北岸，两城对峙，万历年间少保温纯重新修葺城池以后，为方便两城居民往来，在清峪河上建石桥（今龙桥），使南北两城相连，形成三原县南北二城跨河而立的布局结构。在双城扩展的同时，三原县四关城池也渐次修成。西关较为重要，为通三边必经之地，明初即筑郭城，周一里六分，门额雕有“三边要路”牌额。东关城创自明崇贞八年，周三里三分，二年功成“自建城后，邑人竞趋卜筑，烟火鳞集，为一邑胜”[③]。北关即北城，志载无关城。南关，按光绪《三原新志》载，“无城，东西通衢，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亦邑南面之屏障。”但从嘉靖《陕西通志》所绘“城图”，以及光绪《新志》图中所绘“三原县城”，明显可以看出南关有城，尤其嘉靖《陕西通志》所绘“肖钟形城图”，以南关肖钟钮，才使得城池更趋近钟形，因此，可以断定南关当有城墙，光绪《三原新志》所记有误。以上来看，至少至明末，随着三原南北二城以及城外关城的发展，三原县城在外观形态上曾有一个大的改观，从肖钟形城，逐渐发展为跨河而立，四关发展，周围达十五里的城区范围，面积在陕西各县中首屈一指。应该说，明代三原县城的渐次扩展是与其经济发展进程相同步的，清代三原县城虽又有修葺，但基本格局不变。

第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

明清时期，随着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职能趋于多样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景观格局。作为明清时期县一级行政中心，三原县是本县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与其它县城相仿佛，行政与文化设施在城市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具有较重要地位。县治、丞署、典使署分布于县城南门内东街，是本县行政中心。仓储是税粮与荒粮储集之所，三原县城中分布有常平仓二十三座，社仓一所，义仓三处。另设有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漏泽园救济之所多处，可见，明清时期三原县城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各项措施在西北地区是较为突出的。另外，明清三原县的文化较发达，县城内建有二处书院，这两处书院规模宏大，影响远及陕甘数省。学古书院，元延祐七年（公元 1320 年）邑人李子敬出资建。延至民国，为陕甘三省人士肄业的有名学府。宏道书院，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 年）王承裕为其父王恕授徒讲学而设，为陕甘二省研讲儒学的著名学府，清光绪年间，清廷派第一批留日学生茹欲立等人，宏道学生约占三分之一。由于这里文化发达，年羹任陕甘总督时，特呈请清王朝将陕西督学从西安移至三原县。从此陕省学台衙门设在三原城内察院门街。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职能不断加强。明清以后，三原城市景观格局上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同步的城市商业景观越来越突出，各种商业店铺与手工业加工场所占去城市的大部分用地。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原县城市形态有一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从钟形城到夹河双城发展进程中，明代是一关键时期。在城市商业发展上，明代三原县城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大的行业分区。南城老城区是全县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商业市场也主要集中于此。嘉靖年间，三原县南城大致以谯楼（即钟楼）为中心，形成了几大集中的市场区。谯楼位于全城中心，通过谯楼的南北大街为南城中最集中的商业区。谯楼南有米麦市、手帕市、板木市；北有果子市、丝市、铁器市、菜市。由于店铺较为集中，故税课司设于此街。谯楼北，东西走向的书院街为另一商业集中区，布花市与骡马市集中在这条街上。谯楼东织罗巷集中分布着盐店，是南城食盐售卖中心。此外，城中尚有一处柴炭市。[④]北城位于清峪河北，

[①]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②]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③] 光绪《三原新志》卷二《建置志》。
[④] 嘉靖《重修三原县志》卷一《镇市》。

“多晋绅髦士家”[①]，商业繁华程度不比南城，但仍有米市、丝市、盐店市、手帕市、纸市、果子市、菜市、柴炭市等多种行市。西关城明初修建，是三原修筑较早的关城，周一里六分，市况较盛。明中叶西门内外市廛集中，西门内有果子市，西门外又有猪羊市。[②]。

入清以后，三原县城市市场又有一定发展。与明代不同的是，城市商业景观上不仅具有大的行业分区，且形成具有专业分工的街巷格局。

这种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城市主干道及其周围形成大的集中商业区。乾隆年间，南城中以谯楼为中心，自南门至北门，名正街，一名梅香里。“正街两面市廛”由于“水无去路，秋冬泥淖”，乾隆二十二三年知县蔡维倡修，“通砌以石”。书院街是另一处商业中心，乾隆年间“近西一半为民居，近东一半为市廛”[③]，仍以石砌路，交通条件比明代有所改进。北城与西关仍是三原县的两处重要商业市场。同治以后三原县商业发展又出现一次高潮。同治六年（1867 年）陕西回民起义，关中各县均不同程度遭到破坏。泾阳城破，损失至为惨重，“布商徙居于原，各商多从之，由是地益繁盛”[④]。三原成为渭北区域的商业中心，城市市场更加发达。南城中心之处最为繁华，“商界栉比，市况颇振，其最大者为南大街，道幅丈许，而敷石”。其次为盐店街、东渠岸街、西渠岸街、山西街、古山西街、北极宫街、辕门街、崇文巷等均为商业繁盛之区。北城中北街、东街、西街（菜市街）、奎星楼街、柱国街（后街）虽不比南城繁华，亦为商业集中区。另外，三原城南关在清末时商业崛起，市况较盛，“旅舍甚多”。南关商业的崛起主要是受南城商业影响力带动而来，且南关正当西安及其他南部诸县西去北往的门户，故而商业发展，成为三原又一商业集中区，[⑤]商品集散场所。清末三原各商业区集中了大量商品零售与批发店铺，布匹店、百货店、花店（棉花店）、盐店、药材店，不仅规模大，数量也非常可观。以药材店来说，“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街到东渠岸街一带，满目皆为药材店”。[⑥]第二，在城市主干道之外，形成专业化街巷分区。这从三原县街巷名称命名上可以看出。清代三原县出现许多以手工加工与商业行业名称命名的街区，这种商业街区大多非城市主干道路，但行业分区非常明确。盐店街，因曾开设盐店而得名。油房道，乾隆年间形成街道，因最初有桂姓在此开设油房，故名。转灯巷，因当地居民多数以制作转灯为业，故而得名。油房巷，明洪武年间形成，初以巷内曾设油坊，故名，后改为巷。手帕巷，巷形成于乾隆年前，此巷居民以织手帕为业。箔子巷，形成于明洪武年间，以居民经营箔子为业，故名。六合巷，因巷内曾开设染房，染红绿等各色布，得名绿红巷，后改名为六合巷。炭市巷，因巷内设有煤炭市场而得名。马头巷，因巷内设有马驮店而得名（驮音转读为头）。菜市街，因街内设有蔬菜市场，故名。红房巷，曾是染房晒染色布的场子，人称红房场子，街巷因称红房巷。山西街，街上主要以开设布庄行店为主，而这此布庄行店大都由山西籍商人所经营，故此街被称为山西街。[⑦]今天，统计三原县城区街巷，大约共有 67 条，其中直接以手工制作与商业行市命名的街巷即有 12 条之多，近五分之一的街巷名称是以此命名的，当均为本地手工制作与商业行市集中区。而这五分之一的街巷大多又均不是三原县的主要街区，如果加上城市主干道路的商业集中区，不难想像明清三原县城商业街市景观，及其繁华程度。明清时期市镇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中原、华北地区有所表现，江南地区表现为明显，西北地区目前此项研究尚未见开展，从以上对三原经济发展与城市景观格局分析来看，明清西北地区同样存在如三原那种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市镇，其经济发展程度不亚于江南的某些专业市镇。

[①] 马理：《明三原县创建清河新城及重隍记》，《溪田文集》卷三，清刻本。
[②] 嘉靖《重修三原县志》卷一《镇市》。
[③] 乾隆刘绍攽《三原县志》卷二《建置》。
[④] 陕西清理财政局编辑：《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金》，清宣统元年排印本。
[⑤]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 5 月版。
[⑥]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上编第六章《重要都会·三原》，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 5 月版。
[⑦] 《陕西省三原县地名志》三原县地名工作办公室编，陕西省地名办公室审定。1989 年内部印。

五、城市景观变迁与人居、生态环境的优化

明清三原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城市景观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表现在城市外在形态上，同时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割与利用上也有所体现。这此体现一方面改变了城市的景观格局，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使城市生态环境利用更加合理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双城格局的形成，使清峪河水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利用，为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提供了方便。

明以前，三原县城为一肖钟形城，城市建立在清峪河以南的原上，清峪河被阻挡于县城之外，城中只有白渠穿城而过。而三原、泾阳等县均位于黄土原区，地表水埋层深，地下水呈碱性化。井水难以食用，当地人多用井水炒茶，这也是成就明清泾阳西北茶叶贸易总汇之区的一个重要原因。[①]城市居民用水却十分不便，南城之人多饮白渠之水，《县志》记载："白渠旧穿城过，居人多赖以养"[②]。但是白渠本为人工渠道，时有堙塞不通的情况发生，城外的清峪河就成为三原人饮用水的一个主要来源。志载："邑南北二城井水多碱苦，不可食，万家之烹饪浣涤咸取给于此河，故日汲无停，晷庸而汲者什伯计，盖水以生活，而贫者犹藉以养也。"[③]南北双城格局形成以后，清峪河成为城中河，大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既便城门启闭也不能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

第二，龙桥飞渡，使城市景观形成立体化效果，在城市建筑格局上更加优化，并由此引发城市文化的繁荣与活跃。

龙桥，为跨清峪河上而建的石桥。明嘉靖中，太保温纯捐资所建，为沟通南北两城的重要桥梁。桥为虹形，故名龙桥。龙桥跨河而建，状势宏伟，南北两门对峙，楼阁相映，中横石梁，使城市景观逾显宏伟，龙桥的建立，增加了城市的立体效果，在建筑美学上具有相当独到之处。

另外，随着龙桥的建成，这里又形成一处新的城市文化节点。就龙桥本身来讲，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即在南北两城之间，是南北两城居民来往的主要通道，也是人流汇聚的焦点，商品交易与文化活动随之兴起，史载龙桥之上"有温公祠，两旁旧皆市廛"[④]，据调查资料显示，清同治之前，龙桥已形成以民间乐器（锣、鼓、钹等）和社火头盔（狮子、走马、大头和尚等）为主的专业作坊及交易市场，称龙桥市场。龙桥两侧及南北两河坡道旁，店铺密集，作坊小而精。每遇蜡八会，这里便成为两城民众聚集之处，有诗道 "扑面尘沙眼不开，八

[①]明清泾阳既是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也是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这一商业地位的确立，即得利于本地优质的水源。清代西北所销之茶部分来自湖北、江西、安徽，而大多来自湖南。走汉口运入泾阳。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湖南安化等地所出"红茶"产量丰、价格廉，不易酶烂，运输方便，制成砖茶利于保存，因此非常适合西北游牧民族生活需要。但是，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往往需要二次发酵，挤压、压砖，形成"茶砖"。而发酵过程中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好水才能发出香气浓郁的好茶，泾阳恰恰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人炒茶，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从湖南运来之散茶在泾阳经过加工炒制，制成茶砖再销往甘、青等省，这样就确立了泾阳茶叶总汇之区的特殊经济地位。道光年间，官茶进关，运至（泾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万有余人，茶盐之利尤巨。这还仅仅是官茶检做，尚不包括私茶运销。泾阳县从事这一行业人员之众、利润之丰是他处所无法比拟的。

[②]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一《地理志》。

[③]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一《地理志》。

[④]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二《建置志》。

面仕女似风来。驾牛驾马车如许，扎遍南台与北台。更从何处问繁华，演武亭前各自夸，公子冶游争似锦，美人姿态艳如花。”[①]可见这里的繁华程度。

第三，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交通的完善，城市道路建设进一步完备，城市建筑格局更趋于优化。

由于商业的发展，对于城市交通运输能力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明清以来这里的交通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乾隆二十二三年知县蔡维倡修南城正街，“通砌以石”。因正街为三原城中主要商业街区，“正街两面市廛”由于“水无去路，秋冬泥淖”。书院街是另一处商业中心，乾隆年间“近西一半为民居，近东一半为市廛”[②]，仍以石砌路，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为保证运输能力，三原县城以及城外交通道路建筑多较其它地区为宽，大多一丈左右。南城中心之处最为繁华，“商界栉比，市况颇振，其最大者为南大街，道幅丈许，而敷石”。明清的三原县城是西北地区繁华的商业城市，其建筑风格独特，城市街道规划合理，常为时人所称道，与其经济发达是分不开的

总之，由于明清三原县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景观的变迁与人居、生态环境的优化。这种变迁不仅表现城市外在形态上的改观，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与城市职能扩展相一致，城市的商业景观格局不断突显。中国传统城市职能单一，多数县级城镇仅为本县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其经济辐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这样的城镇内部结构也较为单一，行署衙门之外，多为教育与寺庙建筑，商业街区也仅仅围绕在行署衙门周围，形成固定的、较稀疏的分布格局。而明清时期伴随三原城市经济的发展，城镇职能趋于多样化。传统城镇性质发生改变，明代的三原县城一度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大量兼具加工、批发、转卖业务的行店进驻其中，形成大量的商业街区，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进一步加以分割、完善，形成一有别于传统县级城镇的独特布局结构。这种结构的完成也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完成的。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scap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Sany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Pi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ornment and Soci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any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eudal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times in China and reveals human dwelling and ecoenvironmental changes caused b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time. It also discusses conditions, institutions, level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func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landscape change caused b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ptimization of urban ecoenvironment brought about by urban landscape change.

Key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anyua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Urban Economy; Landscape Change

---

[①] 三原县志办《三原县志》第十二篇《商贸》。第 439 页。

[②] 乾隆刘绍攽《三原县志》卷二《建置》。

收稿日期： 2006-01-20
作者简介： 张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